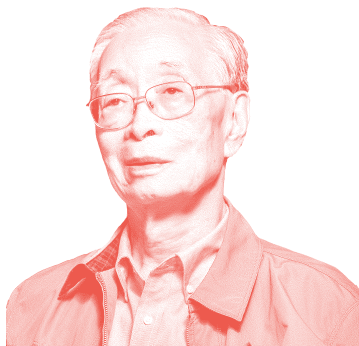


杨福愉

党与群众的关系真
是血肉相连



党的政策方针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党与群众的关系真是血肉相连。

—— 杨福愉

人物简介

杨福愉（1927— ），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生物膜的研究工作，对我国膜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五章·做个人民的勤务员 | 301

运动，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一个接着一个光辉的胜利，是由于党是以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

我出身在一个剥削家庭，解放前夕才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学生运动，解放后由于历次运动中所受到的教育及经过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的学习才初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及党的性质，愿意跟着党走，在 50（1950）年参加了青年团。此后一系列的民主民革运动不到几年时间就改变了旧社会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社会风气，这一切使我进一步感到党的大公无私，光荣正确及伟大……党的政策方针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党与群众的关系真是血肉相连，人民群众的智慧，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我们克服任何困难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解放以后我就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但由于个人名利思想作祟，红与专没有正确处理，加上自高自大的缺点使自己的进步很慢，但党始终给予我很多教育与锻炼的机会，使我在历次运动中，群众工作中不断地提高觉悟水平，在业务方面党亦不断地培养我，派我去德实习，接着又叫我留苏，显然我的一切都是与党的培养分不开的。

党所领导的事业是中国人民世代所盼望的事业，同时亦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事业，前进中的困难还不少，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在高一阵、低一阵地继续

进行着，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彻底实现，我愿意将自己一切力量甚至于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入党以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政治挂帅、以红带专、又红又专的道路，努力克服个人名利思想患得患失及自高自大的缺点……党指向哪里，我就去哪里，党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还应加强群众观点，进一步联系群众与党分配给自己的群众工作锻炼自己，在具体工作岗位上，一方面我应谦虚谨慎，另一方面亦要立雄心大志，为党的事业贡献出更多更大的力量来。

★ 延伸阅读 ★

杨福愉，生物化学家。我国研究生生物膜第一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他1927年出生于上海，原名杨福馥。1950年，23岁的杨福愉做出三个重要决定，与他精彩的院士人生不无关系：



2010年杨福愉在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2010年度夏季战略研讨会作报告

一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后备力量。杨福愉 1960 年在苏联留学期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 年回国后转为正式党员。

二是悄悄地改名，把原名“杨福馥”改为“杨福愉”。以此明志：从对物质“富余”重要性的单纯理解转向对精神“愉快、愉悦”的不懈追求。杨福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部“金牛奖”、中国科学院“华为优秀导师奖”“宝洁优秀导师奖”等多种奖项。

三是在浙江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化学研究所报到。杨福愉从此为生物化学研究奋斗一生，做出突出贡献。

2006 年 10 月，从事生物膜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杨福愉的同事同行欢聚在北京市怀柔区，出席生物膜研究前沿学术讨论会暨庆贺杨福愉院士八十华诞座谈会。会上，展示了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时年 103 岁的贝时璋写给杨福愉的贺词：“我国研究生物膜第一人”。会后，《情系生物膜——祝贺杨福愉院士八十华诞》出版，翔实的文字和珍贵的图片呈现了杨福愉为中国生物化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当杨福愉胞兄杨福耀看到这本纪念文集时，忍不住哽咽，声音颤抖地说：“他从来不和我们说在干什么，做出了什么。看到这个文集，我才知道他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不容易。”

的确，杨福愉做得这么不容易，才做得这么好。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也正如被陈云称赞为“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高士其那样，把原名高仕祺改为“高士其”后，这样解释改名的动机：“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同样，杨福愉

在即将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的时候，把名字中注重物质的“馥”改为崇尚精神的“愉”。随着科研和社会经验的不断积累，杨福愉有了更加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远在苏联留学时，身在异国他乡，杨福愉积极靠拢党组织，自觉接受党的考验，努力践行“共产党人不是做官当老爷”。自从一头扎进新中国的生物膜研究领域，杨福愉就铆足“牛劲”，像攻坚克难的拓荒牛、吃苦耐劳的老黄牛、无私奉献的孺子牛，创造了中国生物膜研究史上一个接一个“之最”：他的《甲状腺中毒大鼠肝线粒体氧气磷酸化的变化》发表在苏联的《生物化学》杂志上，是中国生物膜研究者最早在国外发表的科研论文；他是第一位置身我国第二颗原子弹核爆现场对动物受核爆损伤的远后期效应进行测试和观察活动的组织领导者；他参与翻译英国的《酶》，成为生物化学界人所共知、拥有读者最多的生物化学参考书；他主编的《生物膜》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作为生物膜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杨福愉一次次被委以重任，他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54年年初，民主德国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友好，提出赠送毛泽东主席一台“德国制造”的代表品牌——蔡司新型电子显微镜。民主德国还为此邀请中国选派两位专业人员赴德国对这台设备进行初步熟悉和见习，以便为德国专业人员来华安装时提供协助。中国科学院研究决定选派两名优秀科研人员，生物学方面的选中的正是杨福愉。他们圆满完成在民主德国的工作回到北京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参加欢迎仪式。当年国庆节前，在杨福愉和他的赴德伙伴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德国新型电子显微镜在北京的安装工作。

1955年年初，杨福愉报名参加留苏资格选拔。他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健康检查、文化考试。1956年7月，杨福愉结束了在北京俄语学

院为期一年的强化学习，于当年11月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度过整整一个星期后，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开始了留苏生活。在莫斯科大学，他全身心投入生物学研究，于1960年7月顺利毕业，获得莫斯科大学生物学系哲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

1960年夏天，杨福愉留苏归来。他出国前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希望他回原单位工作，设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则希望把他调来该所工作。最后，组织决定把杨福愉从上海调往北京，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专门为发挥其特长而成立的线粒体研究小组负责人。此后，在由线粒体膜、细胞膜、核膜、内质网膜、溶酶体膜、高尔基体膜、叶绿体膜、过氧化酶体膜等众多“膜”组成的生物膜研究中，杨福愉不断取得突破，多次为研究生物膜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也多次邀请外国从事生物膜研究的著名专家来华交流或工作，不断扩大中国生物膜研究的影响。他还在生物膜领域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

杨福愉于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2010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副会长。

在杨福愉看来，戴上“院士”这顶桂冠，对他来说是一种荣誉，同时又加重了肩上的责任。因为这个称号不只是对自己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对中国生物膜研究发展的嘉奖。他殷切地呼吁：“切不要把院士这个庄严的称号商品化。”

知情人说起著名党员科学家杨福愉“改名以明志，初心永不改”，真正做到了“厚德载物”，常会讲起他和贝时璋志同道合的故事：

1950年，舍“馥”求“愉”的杨福愉改名之后，以“忽略物质财富而追求精神财富”的饱满政治热情走进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此认识了他“追星”一生的人生楷模——时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兼所长的贝时璋。

从杨福愉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看到贝时璋实验室里备有煤气炉和点火用的火柴，而贝时璋每次吸烟都从衣兜里掏出从自家带来的火柴点烟。

1960年，杨福愉结束在苏联3年半勤奋艰苦的留学生活，为了减轻国家负担，自愿自费购买了回国的火车票。

贝时璋、杨福愉等老一辈科学家为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精神，代代相传……